

云南藏区宗教和谐建构背景下的宁蒍涉藏区域经验^{*1}

冯天春 闫润清

【摘要】:宁蒍涉藏区域地处边远、范围狭小,但又极具代表性。当地除藏传佛教外,尚有伊斯兰教、基督教、汉传佛教、毕摩教、达巴教、韩归教等多种宗教形态。目前,该区域的多元宗教处于较为理想的和谐共存状态。在全面展开云南藏区宗教和谐构建的背景下,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从现象、结构、传统、心理、发展等多维视角深入考察其宗教和谐经验并反思得失,不但可有效推进云南藏区宗教工作,激发藏区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也可为当前的宗教研究、管理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和谐模式。同时,还是探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并展现其建设成果的重要实践路径。

【关键词】:云南藏区;宗教和谐;宁蒍涉藏区域;和谐模式

【中图分类号】:B989. 2(274LJ)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7)05—0050—08

云南藏区主要包含迪庆、怒江、丽江三州市中的涉藏区域。^[1]其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同时又有多种世界宗教、民族宗教、原始宗教。由于融含特殊的涉藏元素且兼有丰富的宗教形态,云南藏区的宗教和谐问题有了新的探讨向度和参考价值。当前,云南藏区的宗教和谐建设正在积极展开。为使论题对云南藏区大背景有所回应,又能具体而微,落在实处,笔者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宁蒍涉藏区域为核心来加以考察。宁蒍位于滇西北川滇交界处,是丽江市辖区内的彝族自治县。所谓宁蒍涉藏区域,主要指宁蒍县内受藏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影响较大的大兴镇、红桥乡、永宁乡、拉伯乡、翠玉乡所辖区域。^[2]在藏学界或宗教界,宁蒍涉藏区域名不见经传,相应研究也成果寥寥。但在历史上,该区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重地。即使今天,其重要性也依然突出。因多元的民族结构、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悠久的历史传承,该区域的宗教颇为发达。不但有彝、壮、白、苗、纳西、普米、傈僳等族的相应宗教,更有汉藏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强烈排他意识向来是产生民族、社会矛盾的主因之一,但在宁蒍涉藏区域,却形成了多元宗教和谐并存的良性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云南藏区的宗教面目。同样,对于云南宗教研究、宗教管理,乃至国家形象建设也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故而,笔者深入宁蒍涉藏区域,收集一手资料,探讨其宗教内质,以期小中见大,窥云南藏区宗教和谐共处经验之一斑。

一、宁蒍涉藏区域的宗教格局

宁蒍涉藏区域有佛、伊斯兰、基督等世界性宗教及毕摩、韩归、达巴、东巴等各民族宗教。目前,该区域内有11处^[3]在册宗教场所,400余教职人员,5万余各教信众。^[4]其宗教格局大概如下:

(一)作为主体的九所藏传佛教寺庙

约750年前,藏传佛教传入宁蒍。现存藏传佛教寺院有如下9所:

扎美喇嘛寺。亦称扎美戈巴、刺罗佛殿,位于宁蒍县永宁乡西北角。该寺据传为明代噶举噶玛巴所建,康熙年间被格鲁派

¹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年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当代宗教:多元宗教与云南宗教情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天春,男,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宗教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研究员。闫润清,女,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

兼并，后一直以黄教面目存世。此寺虽地处偏远，但在川滇康藏地区却赫赫有名，曾培养出过洛桑·益希等多位高僧。目前，在册喇嘛有 200 余人^[5]，住持为关加·益希活佛。该寺是宁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也是宁蒗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

泸沽湖三寺。即黑瓦俄寺、里务必寺、日尊寺，均属格鲁派。黑瓦俄寺位于泸沽湖黑瓦俄岛，清光绪末年由永宁土司府建成，后几经毁建，1997 年正式注册，在册喇嘛 7 人。因处湖岛景区，目前此寺多被视为人文景点而进行旅游开发。该寺与外界联系较少，平时住寺僧人仅一两名。里务必寺地处泸沽湖南侧里务必岛，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文革”被毁，1989 年重建。整寺规模较小，由正殿、僧寮、信众房、三座白塔构成，当前也主要被视为人文旅游景点而进行开发。日尊寺原名格登姿寺，在相对偏僻的泸沽湖上村，也属清末古寺，毁于“文革”，2001 年借国家宗教政策复建。寺庙主体为正殿、偏殿、僧寮，在册喇嘛 9 人。三寺是泸沽湖景区重点开发的寺院人文景点。^[6]

萨迦二寺。即达迦林寺、萨雅寺。这是云南省仅存的两座萨迦派寺庙。^[7]达迦林寺位于永宁乡泥鳅沟村增坡。1267 年，在永宁土司府支持下，甘孜巴塘康珠绒布选址建成此寺。目前，有寺僧 70 余人。萨雅寺则始建于 1262 年，原址在新营盘乡衙门村，鼎盛时曾有千余教众之况。清同治年间，萨雅寺毁于红白旗战乱，重建后，又毁于“文革”。1993 年，萨雅寺迁址宁蒗县城东山重建，现已成为城区重要宗教人文景点及信众主要宗教活动场所。^[8]

拉伯二寺。即尼佛寺、松坪寺。属格鲁派。尼佛寺又名尼佛贡巴，位于拉伯乡托甸村吊锅山山腰，有喇嘛 12 人。此寺始建于 1872 年，“文革”被毁后，一直到 2006 年，才在云南省民宗委的支持下重建，如今是拉伯乡的主要藏传佛教活动场所。松坪寺位于拉伯乡格瓦村，始建年代不详，“文革”后仅剩废墟，2007 年恢复重建，结构较为简陋。目前有寺僧 3 人，住持为“熊喇嘛”。^[9]

翠玉确吉的来寺。此寺属格鲁派，在翠玉乡宜底村，2004 年重建，为藏式土木经堂结构，在册僧 8 人。因翠玉乡地处边远且只此一处寺庙，该寺便成了周边信众的活动中心，香火较为繁盛。

(二) 体现藏汉佛教交融的两所汉传佛教寺庙

宁蒗涉藏区域的汉传佛教寺庙有两所：弘圆寺、文殊庙。弘圆寺位于大兴镇三岔河，原为“观音寺”，2005 年注册。内中供奉如来佛、弥勒佛、观音、地母、财神等神祇。文殊庙在城郊大兴社区马店沟，始建于清末，2007 年复建，当前建筑较为简陋。两寺地处藏传佛教氛围之下，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其一，两寺的墙壁、石阶、瓦楞、经幡、壁画等带有明显的藏传佛教元素。其二，内供奉神祇造像已稍有藏传佛教佛像的神秘气息。其三，两寺是当地汉传佛教信仰教众的重要活动场所，信众主要是当地汉族，但有意思的是某些藏传佛教信徒或其余民族也会参与两寺活动。故而两寺虽属汉传佛教，却是典型的藏汉佛教文化交融的产物。

(三) 无固定团体及活动场所的其余宗教

宁蒗涉藏区域不少宗教并无固定组织或活动场所：一类是因信众较少，无法形成较大团体和申建合法宗教场所，如回族^[10]、傣族^[11]、白族、苗族、壮族、傈僳族^[12]等少数民族虽有各自独特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形态，但在宁蒗藏区，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另一类是未建立固定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的。如摩梭人的达巴教^[13]与东巴教^[14]、普米族的韩归教^[15]、彝族的毕摩教^[16]。这 4 种宗教是当地流传较普遍，极具代表性的宗教形态，但都不似藏汉佛教一般有固定团体和活动场所，而是以达巴、东巴、韩归、毕摩作为宗教观念、理论、组织、活动的核心，引领、传承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其“形”颇散。上述民族的宗教虽在理论体系、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方面较为“隐”“散”，但却是当地宗教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及重要特征。

上述为宁蒗涉藏区域宗教的基本情况。笔者在 2010—2016 年间曾数次对德钦、维西、香格里拉、丽江市、宁蒗、兰坪等

地作过调研^[17]，发现云南藏区的整体宗教格局大致相同：其一，以藏传佛教为主，多元宗教并存。其二，出现多宗教融合现象，如藏彝、藏回、藏汉等宗教之间出现不同程度的交汇。其三，存在诸多无固定宗教场所的宗教形态，如毕摩、达巴、韩归、本主等无建立固定宗教场所传统的宗教，以及部分区域回、傣、傈僳等民族因常住人口较少而无法建立宗教场所的“散性”宗教信仰。在此意义上，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且宁蒍涉藏区域也不能代表整个云南藏区，但其宗教结构与云南藏区却异曲同工，能够体现云南藏区的宗教概况。^[18]

二、宁蒍涉藏区域宗教和谐的表现

宁蒍涉藏区域的宗教构成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从一般理论逻辑来讲，当地面临着一个如何妥善处理各宗教关系的重要课题。但是，长期以来，宁蒍涉藏区域却表现出一种宗教间的高度和谐。这是较为理想的宗教相处状态。下文对之略作归纳。

（一）宁蒍涉藏区域的区域稳定性

宁蒍涉藏区域的区域稳定性主要可从三个向度来解读。

首先是宁蒍藏地社会的稳定。一方面，由于康藏建设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进步示范区的影响及自身对和谐稳定的诉求，宁蒍藏地社会形成了较好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氛围。宁蒍县紧接四川木里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两地，一般而言，这种地带都会被作为涉藏重点关注对象。但是，近年来三地开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进步示范区的成果较为显著，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良性的民族、宗教之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宁蒍藏地社会的主体性日益突出。这种主体性，特指作为涉藏区域，宁蒍藏地独立于其余藏区的自主程度。在历史上，各分支藏区经常受制于核心藏区政教合一政权，缺少自主性。但当前宁蒍藏地社会在这方面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它已不再轻易就受到其余藏区或事件的干扰。据当地民宗部门提供的信息，从1950年宁蒍和平解放以来，即使经历了达赖叛逃、“3·14”等重大事件，宁蒍藏地社会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与纯洁性，并未受到其余藏区极端分子或极端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藏传佛教的稳定。某种程度上来讲，宁蒍涉藏区域的和谐首先是藏传佛教的稳定。当前，寺院、僧人，乃至政府民宗部门都在积极推进藏传佛教的稳定工作。

表现之一，寺庙积极树立正面社会形象。宁蒍藏传佛教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关注自身社会形象之提升。例如，2013年，宁蒍全部藏传佛教寺庙参与了“宗教慈善周”活动，主题是扶贫、济困、助残、救灾、助学。这些活动在当地藏传佛教寺庙中已形成传统，每年都会有相应活动展开。2014年，扎美寺、达迦林寺、萨雅寺、里务比寺、黑瓦俄寺等参与了“和谐寺庙教堂”，主题是安全、和谐、稳定。当前，宁蒍藏传佛教寺庙又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文化进藏区”的号召，以宗教文化为媒介，广泛学习外界优秀文化以补自身之不足。一种稳定、积极的宗教同样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至此，宁蒍藏传佛教寺庙已成为当地宗教和谐的一块重要文化品牌。

表现之二，僧众专注于本职工作。一者，僧人转向深研经论。由于“文革”期间宁蒍藏传佛教受到巨大打击，文化传承断裂，僧众的文化水平总体上很低。目前各寺庙已经意识到“文化内推力”的重要作用，不少僧人被选拔到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西藏各大寺、四川各大寺、云南佛学院研学经论，专业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另外，宁蒍不少藏传佛教寺庙中都有印度、尼泊尔回流僧人。这部分僧人普遍接受过严格的佛学训练，有较高的佛学素养，但身份较为特殊。为了解其现状，笔者特意走访扎美、尼佛等寺，对某几位有境外学经经历的喇嘛进行了访谈。笔者了解到，回流僧人回国以后并无出境行为或相应的境外关联，其日常工作转向了研学经教。在扎美寺、尼佛寺，多位回流僧人竟然对《大威德经》《中论》《中观光明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藏传佛教经典有深入研究。这些经论，向来是具有较高学识涵养者才有能力学习的。再者，僧人主持规范性的宗教活动以满足当地信众的信仰需求。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最为敏感，为了解其活动动向及实质，笔者曾在各寺目睹了祭火、丧葬、

转山等宗教仪轨。这些活动紧扣藏传佛教的传统以及当地民众的生活、信仰需要，较有规范性，并不涉及政治等敏感话题。僧人远离敏感领域，专注本职工作，是宁蒗涉藏区域较之其余敏感藏区体现出稳定性的重要指标。

表现之三，严控寺院的新建。在宁蒗藏传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较为敏感的环节是寺庙的新建。因当地藏传佛教气息较为浓厚，不断有僧侣和信众申请建寺，但当地政府出于区域稳定的考虑，严控新建寺庙的审批。近年来，当地民宗部门并未批准过新寺庙建设。虽然有不少乡镇已经出现私自筹建寺院的行为，但当地政府在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维护整个宁蒗涉藏区域稳定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严格控制。^[19]故当地藏传佛教格局基本上还是维持原状。

再次，近年各宗教间并无冲突事件。历史上，由于各宗教、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宁蒗曾经发生过黄教兼其余教派、凉山叛乱等重大事件。宗教间要寻求和睦相处向来是国际性的大难题。从世界范围看，宗教团体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争夺信众、党同伐异等矛盾。不过，在宁蒗县，据当地民宗部门提供的数据及对民间情势的了解来看，从1950年以后，当地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毕摩教、东巴教、达巴教、韩归教之间并没有发生过集体性的宗教冲突事件。这无疑是“宁蒗涉藏区域宗教和谐”最主要的考量。

（二）普遍存在不同教徒和谐聚居的现象

宁蒗涉藏区域各宗教间不但无集体性冲突，还存在一种较为理想的宗教和谐相处模式：不同教徒和谐生活在同一村落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宁蒗县城常住人口有7万余人，其中以彝族、摩梭人、普米族、汉族、藏族居多，但也有少量苗族、壮族、傣族、回族。又如拉伯乡，该乡是宁蒗县较为边远而民族宗教构成情况最为复杂的区域。据统计，当地主要有藏族、普米族、摩梭人、苗族、汉族、傈僳族、壮族等居住。类似的情形在宁蒗涉藏各乡镇、村落极为普遍。如此多种教徒能够共同和谐生活在同一区域实在是一种奇迹。

（三）不同民族对藏传佛教的接受、信仰

当地主体民族是彝族，而最为系统、庞大的宗教团体则是藏传佛教。但这并没有导致其余各教对藏传佛教的拒斥，反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和谐的“藏传佛教文化区域”。相应地，不同民族都出现了接受甚至信仰藏传佛教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摩梭人、普米族。摩梭人本来信仰达巴教和东巴教，而普米族的传统信仰是韩归教，但由于达巴教、东巴教、韩归教与藏传佛教、苯教关系紧密，目前的摩梭人、普米族虽然还保持着自身原始宗教信仰的某些特征，但都已经被置于藏传佛教的庞大理论系统之下，绝大部分摩梭人、普米族已经认为自己信仰藏传佛教。^[20]另外，部分汉族、傈僳族、苗族、白族等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尚值一提的是当地主体民族彝族，虽然绝大部分彝族并不信仰藏传佛教或拒绝承认自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但某些彝族毫无疑问已有接受藏传佛教之实。此处并不是刻意放大藏传佛教的影响力，而是当地藏、彝两族渊源长久，又共属“藏彝走廊”^[21]，加之在宁蒗两者的生活随时交互影响，部分彝族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藏传佛教、藏族文化的某些观念。^[22]是以，各民族之间，对藏传佛教已经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接受甚至信仰。

扩展到云南藏区之全局来看也可发现上述表现、特征。云南藏区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稳定性，不同民族融合、和谐而居的现象较为突出。各民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也是开放的，尤其是汉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情况颇令人惊讶。按道理讲，即使在云南藏区，汉族也应多信仰汉传佛教、道教或儒家文化，但据某些学者及宗教工作者的观点，在云南，对藏传佛教有信仰或情感偏向的汉族数量并不在少数。^[23]其原因固然有汉族具有文化心态上的开放性，不过更多恐怕还应归结于云南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宁蒗涉藏区域宗教和谐之主因

宁蒗涉藏区域形成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现象的核心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对云南多宗教和谐共处现象的分析，需要综合关系

的视角、现象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和心理的视角。”^[24]这种观点无疑也适用于宁蒗涉藏区域。不过，宁蒗涉藏区域的宗教和谐有其特殊性，更有其具体性。故而笔者结合上述四种视角，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来进行考察分析。

(一) 各教派传统及精义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

除却一些极端原教旨主义型的派别，绝大部分宗教都崇尚稳定、和平，尊重人类及各种生命形态。如藏传佛教认为：“觉性菩提心超越善恶因果和迷悟苦乐，无修无治本自解脱，无增无减，住平等界。”^[25]伊斯兰教认为：“穆圣最不愿发怒，最青眯喜悦，最体贴众人，最善待众人，最为大众谋利益。”^[26]东巴教也有自己的平等观念：“迄今为止，东巴教还没有产生至高无上的神，东巴教里的神总数不下一千个，并没有地位上的高下之分。”^[27]其余毕摩教、达巴教等各种民间宗教，都存在“万物有灵”或“平等至善”等层面的观念，并延及自我修养的提升和对其余教派的尊重。^[28]在此传统下，宗教理想常态就是与其余宗教平等、和谐相处。由此也可看出，宁蒗涉藏区域各教派之间，虽然理论系统、表现形式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其内在精神某种程度上存在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让各教派教徒遵循着最基本的为人、处事、发展原则，并演化成了相互间的和谐共处模式。

(二) 藏传佛教寺庙与信众相对独立，当地民间的藏传佛教信仰主要以家庭为单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按照以往的观点，凡是涉藏地区的宗教团体对当地信众都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只要藏传佛教上层一旦存在“藏独”或教派争斗意识，信徒也就紧跟其后变成支持或反对力量，由此，社会的不稳定旋即发生。但在宁蒗涉藏区域的调研中，笔者发现：当前的藏传佛教信仰无疑仍以寺庙团体为核心，信众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传统、感情支持不变，然其信仰形式，或者是日常宗教活动已经变成以“家庭为单位”。也就是说，除了重大的宗教节日外，信众对藏传佛教寺庙的精神依赖、势力依赖逐渐弱化，转而变成在家中供佛、拜佛。甚至与所谓的政治等敏感领域已经没什么联系了。这种构架下，不论宗教团体组织有什么动机或行为，都已无法再鼓动信众力量。如此一来，相应的“藏独”、涉外等事件在宁蒗涉藏区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养料。

(三) 民众、僧众对当前生活状态的认可与主动维护

宁蒗涉藏区域相对封闭，多地甚至处于交通死角，故而该区域长久以来较为贫困。^[29]贫困是不稳定的根源之一，长期处于贫困，再精致的宗教理想或再强势的宗教力量都无法控制民众求转变、求平安、求富裕之心。当前的宁蒗整县正处于攻坚脱贫阶段。从2013年开始，国家加大了对宁蒗涉藏区域的扶贫投入，最突出的变化是绝大部分村落已通水、电、路，尚有未完全通者也正在建设中。宁蒗县甚至有了自己的机场，各民族生活质量天翻地覆。在这种境况下，民众不会随意听受某种宗教势力的煽动而丢弃现在的生活。况且，宗教团体本身也是脱贫致富进程中的受益者，僧众也会珍惜目前生活的来之不易，主动维护本区域的宗教和谐与社会安定。

(四) 宗教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与成效

宗教并非一种独立于国家社会之外的势力存在，因其在思想领域的特殊性，对之进行合理管理、有效引导，可以极大地发挥其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力量。从目前来看，宁蒗县委县政府对宁蒗涉藏区域各宗教的管理较为成功。2012年以来，宁蒗县连续出台了《宁蒗县境外学经回流僧人管理措施》（宁藏办发〔2012〕9号）、《宁蒗县防止突发性僧人自焚事件工作预案》（宁藏办发〔2013〕7号）、《关于切实做好当前藏区维稳工作的通知》（宁藏办发〔2014〕1号）、《宁蒗县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工作办法（草案）》等文件，管理体系益完善。某些做法也体现出了独创性和有效性，例如，“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挂钩联系重点寺庙，重点村社，重点人员的‘包寺、包村、包人’的责任，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值班和信息报送，围绕“3·14”“3·28”“7·5”等重要敏感节点，加强值班，保持24小时通信联络畅通。全面启动藏区稳定日报和零报告制度，确定了专人负责，每日16时之前将当日工作情况报县藏区维稳办。”^[30]在此基础上，统战工作思路越来越清晰，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有效地确保了宁蒗涉藏区域的稳定和谐。

笔者认为，宁蒍涉藏区域乃至云南藏区多元宗教和谐的核心原因均在以上几条。其现有和谐成果须是地域文化传统、藏区特殊情况，以及政府统战部门的努力等因素综合相辅才能达成。这也是云南藏区宗教的特殊之处。相比较而言，某些藏区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中确实存在少量极端主义，以至于无法共同传达各宗教本善、本和平的传统精义。而不少藏民家庭也仍与藏传佛教核心寺庙结合得较紧，甚至形成了绝对依赖或盲目信仰。继之，民众、僧众就容易受到煽动而不懂维护当前生活的来之不易。相应地，宗教工作部门的管理、引导也就更难实施。关于宁蒍涉藏区域取得较高和谐成绩的这些原因，云南藏区的宗教研究者、管理者甚至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者，都有必要深入了解、思考并做出应对。

四、宁蒍涉藏区域宗教现状之反思

宁蒍涉藏区域的宗教和谐现状是可喜的，但是，任何教区都不存在绝对风平浪静的宗教关系，稍有不慎，问题百出。如何更为深入、多维、客观地认识宁蒍涉藏区域的宗教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依然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一) 隐忧：没有绝对的宗教和谐，宁蒍涉藏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宁蒍涉藏区域的宗教构成较为独特、复杂，近年虽无宗教间冲突事件，但以个人矛盾形式，背后却关涉宗教理念争端、团体利益冲突者并不是不存在。据笔者了解，近年当地发生过不少因医疗争端、酒后斗殴、争夺水源等而起的冲突，这些冲突最先是个人矛盾，但最终却被上升到家族或宗教信仰层面，以民族风俗或宗教信仰的形式来解决。如果处理不善，极有可能挑起家族及宗教间的冲突。尤其是藏区维稳工作，更是千丝万缕，隐忧重重。宁蒍涉藏区域的和谐安定无疑值得肯定，但在应对“藏独”、境外势力挑唆方面，绝不可安枕而卧。宁蒍涉藏区域作为云南省较为重要、敏感的区域，涉藏问题处理得妥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当地基层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为减少民族利害冲突及宗教矛盾的发生，维护各宗教和顺与藏区稳定，我们在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必须细心、专心，防微杜渐，及时化解各宗教间的矛盾与不稳定因素。

(二) 脱贫致富是宁蒍涉藏区域深度和谐的基础保障

宁蒍县是一个由 20 世纪 50 年代由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而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县份，是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常常刺激和滋生民族矛盾、宗教争端。目前来看，宁蒍涉藏区域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身处贫困线下。如果当地的脱贫目标迟迟不能实现，难免会有民众将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寄托于宗教，而由这样的基础形成的宗教信仰往往是不理智的、充满攻击性的。另外，绝大部分教职人员虽是本教派的代言人，但本身也出自穷苦人家，绝非上层富贵者。例如，许多喇嘛并不能自己赚取生活成本，而是由家中供养修行。如此一来，贫困同样会影响教职人员的生活、信念，乃至宗教行为。正如前文所说，稳定、自足的生活才是宁蒍涉藏区域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管理、支持宁蒍涉藏区域宗教，不能忽视了脱贫的重要性。

(三) 涉藏区域宗教文化旅游之警醒

在宁蒍涉藏区域，以宗教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作为旅游吸睛点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泸沽湖景区，黑瓦俄寺、里务必寺、日尊寺成了点睛之笔。在永宁乡，扎美寺、达迦林寺甚至成了主体人文景点。由此而带来的附加经济收效是极其明显的。但是，接踵而至的同样有负面的社会评价——对宗教生态的破坏。此处的宗教生态，不独指自然生态环境，更指宗教传统精义的传承和本真情怀的保持。美国学者克里彭朵夫说：“建立在近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旅游业实际上也暗含着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的摧毁意向，旅游必将面对旅游发展和生态破坏之悖论，‘非持续性’终会成为人们的棘手问题。”^[31]大量涌入的游客，并不见得都尊重宗教或有信仰情结，反而扰乱了寺庙的正常程序。这种干扰直接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干扰有修行意愿僧众的正常功课。其次，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旅游部门或寺庙会刻意“给旅游资源披上古代、乡村与原始的外衣来突出其‘他性’，以突出与旅游者的母体文化的反差”^[32]。这种情况下，寺庙的传统精义或所应有的修行本怀会减弱甚至丧失，丧失传统的宗教团体是最令人担忧的，最易滋生不稳定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当地宗教生态与现代旅游的关系，只怕应该当作一个重点课题来加以专门探

讨。

(四) 各教派须关注心性修养的提升，谨防“自我”膨胀

此处说的自我膨胀，实际上是指宗教忽视心性涵养，变成以满足自我利欲、声名为目的。宗教转向追求利欲并不是危言耸听，宗教史上不少宗教都因为过度追求利欲而臭名昭著，祸害无穷。宗教向来是以人格道德的涵养、精神灵魂的升华为己任，但宗教同时又是一种获取利益的利具，缺乏心性的自我把控，必然会带来方向上的偏差。另外，除了物欲，宗教也容易滋生一种以自我教义为唯一真理的偏执。这同样是一种偏离宗教本旨的自我膨胀。关于这一点，德国文化学者艾克哈特论释得较为透彻：“如果你坚信只有你的宗教才是唯一的真理，那就是在用它服侍‘小我’。当你如此使用它的时候，宗教就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产生了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冲突。”^[33]而宗教冲突往往就在此“自我”膨胀的情境中展开。所以，各教派的确应该注重提升心性修养，保持应有的清醒，以防陷入自我膨胀当中。各宗教间要真正做到尊重、和谐、稳定，也必然要从提升僧侣心性修养开始。^[34]

(五) 推进民族团结与宗教和顺工程建设

宗教同样也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才能够安于稳定并充分发挥其独特价值。在宁蒍涉藏区域，民族、宗教工作是一体的。笔者了解到，当地民宗部门已经前瞻性地设计了未来几年所欲完成的推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项目。例如，打造彝族毕摩文化特色村、普米族韩归文化特色村、摩梭人母系家庭特色村、傈僳族文化特色村、藏族特色民居村。又如，依托萨雅寺建“东山文化长廊”、完善扎美寺及达迦林寺大殿室内笔画工程、修葺两所汉传佛教寺院。这些项目的实施，是支持各民族及宗教正常发展的实际行动，可解决其后顾之忧，创造一种和谐、稳定的氛围。

(六) 教团管理仍需加强并科学化

宗教有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模式，但在整个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其模式必须符合整个社会的安全和谐需要，这就要求宗教管理部门对宗教加强科学有序的管理。针对宁蒍涉藏区域宗教的特殊构成及敏感环节，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其一，整顿不在册宗教场所。如前文提及的几处“不在册现象”，应责成补全合法手续，或应依法取缔。其二，加强回流僧人管理。据当地民宗局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宁蒍县私自出境滞留国外学经的有49人，目前已回国28人，最近又有5人申请回国。对这部分僧人，要做到关心到心但严格把关。其三，加强建设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即分管宗教工作领导干部、宗教工作干部、宗教界人士。提高县、乡镇工作干部的专业水平，增强宗教人士的和谐稳定意识。其四，组建宁蒍县宗教协会。从各宗教中抽选较有威信者组成宗教协会，以更及时地了解各宗教动向，更有效地调解各宗教矛盾。

所谓反思，乃笔者针对宁蒍涉藏区域宗教现状而作。其中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云南藏区宗教的共性。但是，云南藏区毕竟比宁蒍涉藏区域要大得多，复杂得多，以上反思、建议，有其合理性、实用性，当面对全局性的云南藏区时必须结合各区域情况才能做出更为具体、有效的应对措施。

上文为笔者在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云南藏区宗教和谐建设背景对宁蒍涉藏区域宗教和谐经验的粗浅考察。总言之，宁蒍涉藏区域的宗教构成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世界性宗教、民族宗教、原始宗教交相共存，并充斥着较为敏感的涉藏元素。然而在此各宗教性格相差甚远，宗教位置极其微妙的格局中，宁蒍涉藏区域却存在明显的和谐现象。不论是藏区社会、藏传佛教，乃或其余宗教之间都能够和谐共处。其原因多维多重，既有各宗教自身传统的原因，也有当地文化溶解力的原因，还有政府干预的原因。这种宗教相处模式值得重点探讨。从此模式自身讲，其中是非得失，均可为云南藏区的宗教和谐建设提供经验、教训。立足于全省藏区宗教工作的大背景讲，宁蒍涉藏区域的宗教和谐却又属于云南藏区宗教和谐工程建设的突出成果。同样的道理，当上升到国家形象的高度来看，这种和谐模式不但提供了国家和谐形象建设的重要经验，更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和谐形象建设的显著成绩。当然，任何一个区域的宗教都是某种社会关系中的复杂存在，我们绝不能凭主观想象或一孔之见就断定其有无隐忧，

宁蒗涉藏区域的宗教也是如此。今后，如何对其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管理，如何更深层次、有效地借鉴经验，服务于云南藏区宗教和谐建设，服务于国家形象建设，依然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

注释：

[1] 云南藏区并非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迪庆、丽江、怒江三州市，三地中尚有非涉藏区，而其余州市中也会有较小的涉藏区域如大理下关的“藏族村”。

[2] 就宗教构成看，因宁蒗县的主体民族为彝族，其主要宗教观念或形态也为彝族所信奉的“毕摩教”。不过，这是一个多元民族宗教共存的区域，从宗教文化的系统性、理论体系的精密度、宗教组织的严格性等来看，对当地及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却是藏传佛教。尤其是在涉藏的大兴镇、红桥乡、永宁乡、拉伯乡、翠玉乡，尽管有彝、汉、纳西族摩梭人、普米、藏、回、壮、苗、傈僳等多种民族聚居，多种文化、宗教交融，非常明显的却是藏传佛教已经起到了主体性作用，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文化与生活。故而本文所说的宁蒗涉藏区域虽主要指上述 5 个涉藏乡镇，却非一个绝对固定的行政区划概念，广义上也包括受藏传佛教、藏族文化所泛化影响的其余民族甚至某一部分彝族地区。

[3] 宁蒗县注册宗教活动场所共有 13 处，因西布河乡不属涉藏地区，该乡新村、潘落两所基督教堂便不计入内。当然，这并不是说宁蒗涉藏区域内无基督教徒，而是指当地基督教徒无官方注册的教堂和组织。例如在县城所在地大兴镇，有一定数量的基督教徒及某些活动场所。

[4] 该数据只收录官方公布者，据笔者调研，为满足当地信教群众正常信仰需求而建设但未收录在册的寺庙也存在，教职人员、信众的数据近年也呈上升态势。

[5] 日常间，扎美寺只留守一两名喇嘛轮值处理事务，余者各自在家、在外活动，寺院有法会或重要事情时，才又聚集。

[6] 黑瓦俄寺、里务必寺、日尊寺是宁蒗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寺庙，因地处山水胜景，永宁土司府一度非常重视，庙宇僧众也兴盛一时。民国、文革及之后一段时期，因中国的特殊国情背景，三寺多次被毁，后遂破败不堪。1997 年，出于打造泸沽湖旅游景点的需要，当地政府及民宗部门同意三寺注册并逐步重建，始成今时盛况。

[7] 萨迦派在云南藏传佛教史上一度辉煌，建寺度僧无数，但经后来的教派斗争，多被改宗格鲁，及至目前，整个云南省的萨迦派寺院仅存宁蒗的达迦林寺、萨雅寺。

[8] 目前此寺有 20 余喇嘛，笔者前往调研时，寺中仅住持周丹史在山地劳作，其余喇嘛都不在寺。据了解，寺僧日常均是这样半僧半农的“散养”状态。因人手不足，做功课法事时，住持换上僧服主持，结束之后，又换回世俗装扮，参与必要的生产劳动。

[9] 松坪寺是宁蒗藏传佛教寺庙中较为简陋者，目前有一间正殿、两间偏殿。笔者前往调研时，发现连寺庙大门也未完全清理完毕。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无法拨付专款修葺，松坪寺也因人力单薄、信众较少而无法完成较大的资金筹措。值得一提的是，经交谈，住持“熊喇嘛”是一位广学藏传佛教经论的老喇嘛，言谈举止之间，颇能引用一些经文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10] 宁蒗县城有一处“清真寺”，是当地穆斯林的重要活动场所，但此寺设于民居三楼，当是以某家庭为主而建立的小型宗教活动场所。据了解，当地民族部门并未将其视为正规宗教活动场所，故本文理解为宁蒗涉藏区域内无合法在册清真寺。

[11] 傣族普遍信仰南传佛教，宁蒗县也有少量傣族，但并无宗教活动场所，而是以家庭信仰为形式。

[12] 宁蒗县西布河乡约有百余户傣族信仰基督教，有固定的新乡、潘落两处教堂，但其余地方的傣族还是以信仰本民族的“毕扒”（傣族巫师）教为主，少量也受周围摩梭人、普米族、藏族影响而信仰藏传佛教。

[13] “达巴”是摩梭人的巫师，达巴的职能是主持本族群的祭祀、祈祷、诵经、作法等，是其族群的最高级知识分子。达巴教受藏族苯教影响较大，在仪式、法器、神祇系统等方面与苯教极为相似。

[14] “东巴”是纳西族的巫师。在云南，摩梭人的族类识别为“纳西族”。达巴教和东巴教在远古时代均受藏族苯教的重影响，二者极其相似点。宁蒗的诸多摩梭人同时信仰达巴教和东巴教者非常多。对摩梭人而言，二者甚至只是形式、地域的信仰区别而已。

[15] “韩归”指普米族的巫师。韩归教以鸚鵡为图腾。按普米族语义，“韩”为鸚鵡，“归”为“美丽”，合义为“美丽的鸚鵡”。大抵喻指巫师言辞如鸚鵡般善于学舌会道，作法时候的着装如鸚鵡羽衣般多彩，舞姿如鸚鵡飞翔般美丽。

[16] “毕摩”是彝族的巫师。“毕”为“念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毕摩被视为可通人事，接神鬼，职能遍及祭祀、行医、占卜等，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又是彝族宗教活动的领导者和主持者。

[17] 其阶段性成果《香格里拉藏传佛教发展现状考究》一文可作参考，见《西藏研究》2015年第3期。

[18] 实际上，宁蒗涉藏区域的宗教形态正是云南藏区中最为丰富的。

[19] 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多处未在册的私建寺庙，有的只是个宗教活动场所象征，并无僧人住持。有的有少量僧人暂住。当地民宗、公安部门较为关注并对之有一定限制。例如，2015年11月25日，永宁乡扎实村建成大悲尊胜经堂，此寺并未经当地民宗部门批准，故“决不允许举行任何形式的法会活动”并被要求上报、公布建设资金情况。

[20] 笔者曾在拉伯乡、永宁乡、大兴镇对多位摩梭人和普米族进行了访谈，得到的基本自我认定都是“信仰藏传佛教”。事实上，普米族、摩梭人的藏传佛教信仰当中存在大量的达巴、东巴、韩归教元素，只是由于藏传佛教色彩太浓，而信众又不是专业的宗教研究者，不会对其中的宗教成分做出甄别。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藏传佛教信徒的实质。

[21]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人类学概念，主要指香格里拉境内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处及周围藏彝民族、文化交汇共存之区域。

[22] 笔者接触过不少彝人，在语言上，他们可与藏人做一定的交流，并且能听、擅唱藏族歌曲。在对藏传佛教名寺及各藏区的认识上，还说得头头是道。

[23] 具体数量并不可知，但据笔者的长期了解，此说当有其合理性。

[24] 张桥贵：《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云南经验》，《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第35页。

[25] 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26] [阿拉伯]安萨里：《圣学复苏精义》（上册），张维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4页。

[27] 戈阿干、和晓丹：《王国之梦——顾彼得与丽江》，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28] 笔者在向各教派信徒的信息采集中，曾与他们谈起这种最基本的教义传统。许多人并不明确知道自己的教义是些什么，但受文化传统的熏陶还是有着自己的理解。例如在县城一家清真饭店用餐聊到信仰时，店主还谈及《古兰经》要他们做诚实的人，要帮助穷人等理念。

[29] 宁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目前全县正积极展开脱贫攻坚。

[30] 宁蒗县民宗局编：《宁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材料·宁蒗县佛教协会2015年度工作总结》（内部材料），2015年，第103页。

[31] Krippendorf. *Tourism in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Society*. 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6 — 13, P525 — 531.

[32] 彭兆荣：《阳光下的阴影：现代旅游的一种价值隐喻——东南亚旅游发展的思考与案例》，《创新》2007年第3期，第5—12页。

[33] Eckhart Tolle, *A NEW EARTH: Awakening to Your Life's Purpose*. Penguin Press, 2008, P70 — 71.

[34] 这一点，对于宗教工作人员同样重要。